

学术休假当然是符合教师成长规律、有利于教师学术积累的好方式,但公众的质疑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好的办法,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吗?

学术休假 福利? 权利?

■本报记者 陈彬

当一位大学老师已经享有了寒暑假,还有没有必要再给他一年的自由时间,供其调整状态,充电学习?

面对这样的问题,相信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没有必要”,否则,教授们就有些太“清闲”了。然而,当这一年的自由时间被冠以“学术休假”之名后,问题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

不久前,媒体曝出,北京语言大学拟自今年起实行学术休假制度,该校的16名教授将享受为期一年的自由时光。此消息一出,立即有舆论质疑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福利”。

对过去几年的国内高教新闻稍加留意的话,不难发现近些年国内对于学术休假的是是非非已经争论多时,至于其究竟是一种“福利”,还是教师应得的“权利”,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见解。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舶来的“休假制度”呢?

“脑残”的质疑

事实上,对于公众对学术休假属于“学术福利”的质疑,很多高等教育界的人士并不以为然。

比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北京语言大学副校长戚德祥曾表示,在发达国家的大学,学术休假是一项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给教师一段“休假”时间,既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业倦怠感,又可自由支配这段时间作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就利用学术休假时间来我国内地高校做访问学者,共同开展研究。

“学术休假不是简单的休息、疗养。”戚德祥说,学校希望老师们从繁忙的教学工作中抽身出来,整理下自己5年、10年的学术积累,集中一学期乃至一年的时间去思考、写作,或到国内外高校进行学术交流。

如果说戚德祥的解释可以算是面对质疑时的“自我辩解”的话,那么在国内某个以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主的网络论坛上,很多人对于所谓“质疑”的态度,也可以反映业界对于这一制度的欢迎程度——几乎所有的网友都对这一制度表示赞赏和欢迎,有网友甚至直言,那些对学术休假的质疑简直有些“脑残”。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业界大受褒扬的学术休假制度,在社会公众层面却遭到了广泛质疑,这种反差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从原理上说,学术休假当然是符合教师成长规律、有利于教师学术积累的好方式,但公众的质疑也有一定的道理——有好的办法,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吗?”采访中,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林中祥问道。

如果细究公众质疑内容,不难发现人们的聚焦点大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行的考评方式下,学术休假是否会成为少数“实权派”的“专利”;二是冠以“休假”之名,学术休假是否会真的会演变成“简单的休息、疗养”。而事实上,类似质疑在多年前已经出现。2012年,吉林大学公开试点学术休假时,有舆论担心这是另一种“腐败”,而此前,某

高校人事处曾组织一场为期7天的“学术休假”,路线为对某著名的长寿村及其他景点的“考察”……

“面对目前国内高教界严重的行政化倾向,教授素质的参差不齐,谁能保证公众的担心不会变成现实?我们当然希望学术休假制度能在国内顺利铺开,但现阶段,我很担心这种制度最终会演变为少数人的“专属福利”,”林中祥说,“别忘了,我们有大量的教授开办自己的公司和企业。一年的时间,足够他们好好打理一下自己的‘业务’了。”

模糊的框架

为了保证学术休假真的被用于学术用途,很多试点学校也采取了一些制度安排。以北京语言大学为例,该校便在通知中规定,老师在休假期间要与所在的院系联系,还要在休假后提交报告。

然而,这样相对宽泛的规定,是否能产生足够的约束作用却是个问题。

2012年,就在吉林大学出台学术休假的相关规定时,曾有媒体致电吉大相关部门,希望了解规定的详细内容,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只有大体框架,相关细节还没有弄清”。而就在吉大的“学术休假令”颁布后的几天,又有5所院校相继出台了类似“只有大体框架”的规定。

“学术休假当然需要给教授以足够的自由,但这并不代表高校不应对其一年的活动置之不理,框架的模糊很容易导致教师学术休假的变质。”某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在采访中这样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外,各校有关学术休假的政策大体相同,一般涉及取得休假资格的服务期限,休假的目的,休假前的要求,同一时期休假教师的数量,休假期间的薪酬,休假后的职称、职位、资历等权利问题,以及休假的期限。对于教师在学术休假期间的活动,高校其实是处于“置之不理”状态的。这是否意味着国内高校也可以如此呢?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王向荣并不这么认为。“国外高校对于教授的管理相对宽松,这首先是由于其教授资格授予相对严格,教授对自身的学术声誉和学术荣誉感更强。同时,国外高校相关配套政策也已经比较完善,因此可以给予教授更多的自由。然而,国内高校由于相关机制体制并不完善,教授本身的‘含金量’无法与国外相比,某些教授的学术自觉与自律性也有待提高。因此,我们在制度层面上做更多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王向荣说。

两难的处境

王向荣早年曾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于学术休假这种在国外十分常见的制度,他并不感到陌生。但是,回国的这些年,他却再也没听说过有谁曾享受过学术休假的“待遇”。

事实上,自本世纪初,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在内的高校试点“学术休假”以来,国内曾享受过这种“待遇”的教师的确凤毛麟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角。甚至一项2009年的统计数字曾显示:如果自2004年算起,5年间,国内真正享受过学术休假的人数为零。

对于这一状况,王向荣并不觉得奇怪:“相比于国外,国内高校教师的教学压力要大得多,教学都是在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进行,教师几乎没有条件长期离开。”

王向荣的这番话的确能找到事实佐证。在接受校内媒体采访时,该校的多位教授对该制度大加赞赏,但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短时间内不打算申请学术休假,原因出奇一致——不想影响教学。“每学期课程都比较多,学术休假会给教学带来影响,也可能给教学管理带来麻烦,所以还没有这样的打算。”该校某教师这样说。

于是,国内高校教师面对学术休假制度时,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制度未来时热切希望,当制度真的落实,却又因为手头繁重的教学、研究压力而不得不选择放弃。事实上,面对这种两难处境的除了高校教师,还有“水土不服”的学术休假制度本身。

林中祥直言,学术休假的本质是为有志于学术和科研的教师提供一段避免其他干扰,能够根据自身意愿从事学术交流和沉淀的时间,而在现阶段,国内高教界,由于大环境的限制,很少有教师能够真正具备这份内动力和自觉性。因此,在没有足够的大环境保障的前提下,学术休假制度在国内并没有生存环境。“大环境不调整,学术休假最后搞成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

“如果没有大学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切实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学,只怕学术休假这样的好制度也难有生长的土壤。”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奇也发出类似的感慨。

多余的压力

然而,无论人们对学术休假的褒贬如何,一个

客观现实是不容否定的——学术休假制度本身对缓解教师的职业压力、提升学术素养是极具好处的。而当这一制度遭遇“水土不服”时,我们又该如何减少教师的职业压力呢?

以王向荣所在的风景区园林专业为例,他目前所面对的压力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是教学和学生培养的压力,其次是科研压力,第三是社会服务和项目实践压力,最后是学校和学院各种事务的压力。

“其实国外高校教师的压力也不小,但他们所面对的压力更加集中于教学和科研,高校对其事务性的要求相对很少,而且学校给予他们‘消化’这些压力的时间也很长。相比之下,我们的老师要面对太多无关教学、科研的事情,相关部门的要求有时也显得有些短视。”

此外,王向荣表示,目前在国家层面上,总体过于量化的评价体系也给了教师很多不必要的压力。“比如大量的考核指标,众多的排名,这些都无形中给高校施加了太多的压力,高校只能将这些压力转移至教师身上,每年要求教师作出各种成果,这样的学术研究很难有深度。而必须完成的某些考核指标对于学术积累和教师的进步并没有帮助。”

对此,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教授蒋书铎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观点,他表示:“现在有一个不好的趋势是管理者把量化问题看得越来越重,这就很值得忧虑。量化只是一个导向,唯‘量’是从肯定不利于学术发展……我们必须正视唯‘量’是从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如果能够在政策层面减少教师身上不必要的压力,即使国内目前还难以实施学术休假制度,教师的学术成长环境也会得到显著地改善和提高。反之,如果教师身上的那些压力不予消除,甚至愈加沉重,即使实施了学术休假制度,又能起到什么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并不在制度本身。”王向荣说。

中国大学评论

《中国科学报》4月10日发表了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卢晓东的文章《欢迎中国科学院大学》。文章从科教融合这一世界科技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出发,谈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的成立对中国高等教育将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设想在中科院大学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大学系统的可能性的重要意义。

中国科学院大学2012年成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多反响,赞誉和非议都有,最大的非议是“名不正、言不顺”。这也符合新事物发展的常态——社会公众对任何一项新事物的理解和接纳,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主流学术界、评论界不能积极、主动、有力地“发声”,不仅会严重误导公众,也会误导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卢晓东的文章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系统和科研机构各司其职,大学专职教书育人,科研院所专门开展科学研究——建国以来我国的大学系统和科学院系统就是按照这种理念而构建:大学集中精力培养“四化”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科研机构集中力量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尖端科学研究。国科大更名以来,有评论认为科学院不懂基本的社会分工,也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严格“划界”的观念在实践中的反映。

在短期内,如果对人才、资源等有明确的约定,这种“二元”结构是有效率的。建国初期30年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科学院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效。但长期来看,这种“二元”结构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并制约各自发展:大学在培养高端人才时必须以高水平的科学研究作为支撑,更何况,如果仅仅把自身定位为“人才培养”这一层面,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怎么可能?科研机构在开展尖端研究的同时必须依靠创造性的头脑,特别是有理想、有锐气、有智慧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是“弯腰干活”的“科研民工”,更是科技事业的明天。从历史的角度看,最初,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国家建设中承担着不同的使命,经过长期发展,大家一致认识到,要更好地完成这些使命,需要的要素是互通的甚至一致的,比如,国家的重视和财政支持、参与重要科研计划和项目、杰出的领军人才、聪慧的年轻人等。具备这些要素之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产出又有相似性,如高水平的毕业生、重要的成果产出、在公共决策中贡献思想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高端人才培养相结合,是当今科技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型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则是实施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高端人才培养的重要主体。

在卢晓东的文章中,还有一个“设想”,就是比照加州大学系统,建立中科院大学系统,使中科院成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孵化器”,这一设想以中国科学院现有研究力量为基础,配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地区发展战略,将更好地和更大范围地促进科教融合,迅速提高中国大陸和一流大学的数量。这一设想,不仅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情怀。

国外有许多大学系统,如加州大学系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等,这些大学系统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大学系统之间在发展目标、办学层次、培养理念方面具有不同的定位;在同一大学系统内部,有一个总校,有多个分校,总校负责战略规划、政府关系、资源配置等,分校为独立办学实体,分校之间优势互补,但实质上为竞争关系。不同的大学系统,是一个国家大学创新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差异化定位、有序化竞争、优质化服务,是大学系统建设的关键。在国内,大学系统的概念还没有普及,与之相近的概念是大学联盟。大学联盟是一个松散的利益共享机制,特别是在优质生源争夺中形成合力,“协调与整合各参与院校之研究与教学资源,但仍尊重各参与院校之独立性”是大学联盟的关键词。中国大陸的大学联盟包括C9、卓越联盟、华约联盟、北约联盟等。

大学系统与大学联盟有本质不同。如果大学合并是1+1=1,大学联盟是1+1=1+n,那么大学系统则是基本接近1+n=1(n等于左边的n与右边的N不同,在1个系统总校的统辖下,n个分校各自的办学理念 and 实力得以重塑,形成N个强有力的办学实体);如果说大学合并的关键词是“学科”和“规模”,大学联盟的关键词是“利益”和“共享”,那么大学系统的关键词是“理念”和“治理”——在同一大学系统内部,以相同的理念进行治理。大学联盟拆解了高校之间的隔阂和围墙,使具有相同诉求和属性的大学可以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大学系统则要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内部形成高水平的“块状构造”,形成块状提升效应,促进我国科技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因而,笔者对卢晓东的“欢迎”表示感谢,对“设想”深表赞同。构建中科院大学系统的基本理念应该是科教融合,基本模式是总分结合、基本路径是循序递进,基本结构是开放竞争。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开门延揽杰出的教育家加盟,相信他们能把把握教育规律并循循善诱教育本质去推进教育创新;需要避免路径依赖——不管是大学系统,还是研究型大学孵化器,都是全新的事物,需要打破常规、革除旧习,认为凡是自家过去的一切就是好的、对的、合适的,懒得改、不愿改、不能改,这不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组织结构的创新是长期的,构建中科院大学系统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理念正确,方向明确,就有意义,就有希望。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

构建国科大系统须避免路径依赖

■贾玉余

壹月教评

75所高校发布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近日陆续在学校网站发布了2013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报告发布不久,就被媒体、第三方调查机构指出存在就业概念不清晰、就业率的统计口径不明确、截至时间不一等问题。

毕竟是政策先行,出现问题可以理解,但是高校总是发布缺少实质性内容的报告,着实让人怀疑其做事的决心。如果说“注水”是因为教育部没有制定科学的标准,高校缺乏“自揭其短”的勇气,那么,“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评价机制则更应批判。

此次,教育部的规定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委托第三方评价”。但是,真正引入第三方机构的高校并不多,仅11所。为此,有专家呼吁,在第三方机构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条件下,可让其更多地发挥分析和监督作用,对报告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发表审计意见,然后再过渡到完全的第三方评价。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港校内地招生11年

用“退烧过后魅力不减”来形容2014年港校内地招生的情形可谓恰如其分。日前,香港高校公布了2014年内地招生计划,并陆续前往各地开展招生宣讲。

回望港校内地招生的11年。2003年是港校北上招生元年,当年的招生范围仅限全国6个省市,大多数内地考生和家长对港校保持了观望态度。随着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加入招生队伍,港校迅速在内地火爆起来。之后的几年间,港校完败北大、清华,各省状元大有“打包”读港校的趋势。直到近3年来,“港校热”才逐渐归于平静,并出现了高考试元港大退学复读考北大、高考试元获得20分加分后放弃港大的行为。

从过去,考生、家长对“什么学校更适合自己?”“这个专业,考什么学校,到如今考生已经学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不可不谓之进步。

事实上,在高等教育普遍开放的当下,港校内地招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狼来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内地高校自主招生、培养计划的不断变革。近年来,内地高校自主招生也出现了不少有创意的面试考题,以及针对领袖人才、科研人才选拔的培养计划,这些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港校的启发。

19所高校将互认慕课学分

随着上海交通大学研发的中文慕课平台“好大学在线”上线,近日上海西南片19所高校宣布将互

认慕课学分,学生可借助平台跨校辅修第二专业学士学位。

尽管“好大学在线”不是内地高校发布的第一个慕课平台,但上海西南片19所高校却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互认慕课学分的联盟。

学分互认一直是高校发展中的共识,长期以来实施不力,主要是受限于物理空间,如今慕课通过网络就可以实现课程、学生的交换,免除了物理空间上的障碍。慕课固然方便了学分互认,但制度、管理层面的设计尚待跟进。有专家指出,如何实现等效的学分互认,还涉及到证书的发放、学位授予等问题,因此必须先作好制度设计和超前的政策研究。

而在更多人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学基于何种条件承认学分。换句话说,慕课最难实现的是学习效果可信度的确认。如何确保电脑前坐着的是学习者本人?如何保证学业成果的质量?这才是保证慕课学分有效的关键。

292所独立学院验收延期

最近,独立学院发展中的“死结”,随着一道延期令浮出了水面。

此事必须追溯到2008年教育部颁布的《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根据规定,5年内独立学院将调整充实,过渡期满或真正独立,或由母体高校继续托管,或并入公办大学。

然而,期满之日全国315所独立学院中只有23所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民办本科高校,另有8所独立学院转入转设考察、公示期,仅占独立学院总数的10%。鉴于该情况,教育部近日决定把验收的最后期限延迟到2016年。

之所以绝大多数独立学院陷入验收难的困境,源自政策与实际的脱节。独立学院的举办始于1999年,而2008年教育部才出台该管理办

法。该办法从法律上要求独立学院向合法化过渡,但在执行中却缺乏可操作性。例如,该办法要求独立学院必须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而现实中独立学院中有政府出资,也有国企投资。该办法同时规定,独立学院没有完成资产过户就无法通过教育部考察验收。

因为出资方、校园面积等所谓的“硬杠杠”,让一大批独立学院走向“死亡”,似乎有“冤死”的嫌疑。然而,作为政策的制定方,为什么制定之初要设定土地、资金等限制性要求,而不是以验收为契机,敦促独立学院向职业教育转型,令人费解。

49名高校校长卸任后入仕途

近日有媒体梳理了116所“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发现自2000年以来卸任的校长履历中,共有49名高校卸任后,曾担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

卸任校长的出路主要有三个方面:出任部长,到地方开启仕途;留校治学完成学术专著。前两种出路被一些人认为是官本位的延续,没有发挥教育家应有的作用。

事实上,“校长去哪儿了”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中国大学校长通常由上级任命,副部级高校的校长本身还是副部级的干部,他们卸任后一部分人出于国家需要或自愿选择,想做一名纯粹的教育家并不容易。于是,近年出现了一种现象——卸任校长纷纷进入有“二政府”之称的协会任职。

有专家指出,这并不利于挖掘卸任校长的潜能。校长卸任后去向应更加多元化,一些文科高校校长可以转而成立第三方督导,利用自己多年的管理经验和理论知识,监督、促进政府管理;一些适合做管理的校长还可到企业发展,还可有部分公立大学卸任校长到民办高校担任校长,促进高校生态的平衡发展。(温才妃)